



萬華弱勢者處遇—— SARS、新冠疫情的差異

文 | 戴伯芬 |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2021 年 5 月 12 日臺北市萬華區茶店爆出兩名女子確診，引發萬華社區感染的恐慌。5 月 15 日，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暴增到 180 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立即宣布臺北都會區疫情提升至第三級警戒。臺北市單月確診人數 1,170 人，萬華區就有 659 例，佔 56%，成為疫情熱點。為此，市府在萬華區加設了 3 個快篩站，一天篩檢人數近千，陽性比率落在 7~8%，甚至曾突破 10%，等於十人中就有一人可能確診，顯示疫情嚴峻。

捷運西門、龍山寺站部分出入口關閉，路上車流大減，人煙稀少，只有幾家店面半掩，部份的外送員拒絕送餐到萬華，原來通勤者也繞遠路避開萬華週邊道路，昔日騎樓鶯鶯燕燕的景象亦不復見，只剩無處可棲的街友依然留置於艋舺公園內。中央指揮中心下令在萬華區居民的健保卡上註記「萬華高風險族群」，雖說是疫情嚴峻下的非常措施，卻讓萬華人承擔病毒破口的罵名（江慧

珺、張茗喧，2021 年 5 月 28 日）。萬華居民在上班時備受同儕壓力，有人甚至被公司要求先在家自我隔離，或者先快篩之後才能上班。某新聞臺的政論節目以「萬華病毒」為標題（蘇思芸，2021 年 5 月 19 日），更加深社會大眾對於萬華住民的污名與歧視，萬華人 2003 年 SARS 的惡夢似乎又再重演。

2003 年，臺灣經歷了解嚴以來前所未有的 SARS 危機，萬華是當時的重災區，累積了不少防疫經驗，十八年後再次面對新冠疫情，政府與民間社會對於疫病的態度與回應方式是否有所不同？政策與民間社會的改變對於萬華的弱勢群體又有什麼影響？本文以萬華的弱勢群體為對象，回顧國家兩次防疫政策對他們的作為，探討臺灣的政府與社會因應疫情的學習與轉變。

SARS 的污名印記

2002 年 11 月中國廣東省爆發不明原因肺炎，旋即擴散到香港。2003 年 3 月 14 日，臺灣發生第一起 SARS 境外感染案例。4 月 24 日和平醫院封院、4 月 29 日仁濟醫院封院，通報感染案例從 3 月的 10 例、4 月 119 例、5 月高峰期 200 例，一直到 7 月 5 日臺灣正式從世界衛生組織疫區除名，總計出現 665 個病例、180 人死亡¹，造成全臺長達四個多月的 SARS 危機。

位於首善之區的臺北市，通報感染案例居全臺之冠，SARS 是近來臺灣政府第一次面臨全臺規模的傳染病挑戰，除了和平、仁濟兩家醫院因為疑似群聚感染而陸續封院，萬華區的華昌國宅更創下臺灣光復以來首度因防疫而封街的記錄（戴伯芬、吳偵宜，2015：9）。2003 年 5 月 7 日，萬華里長聯誼會召開防疫記者會，對當時政府防疫政策開了第一槍，指責和平醫院危機處置不當，使疫情從中正區的院內移轉到萬華區院外，街友、流鶯等「偏差者」也被當地里長標籤為「SARS 的散播者」，要求政府嚴格控管（郭慧明，2004）。5 月 8 日，萬華區中低收入的華昌國宅居民傳出獨居老人死亡事件，

被媒體以「社區感染 四百居民住以待斃」標題，渲染成病毒社區感染擴散，「萬華封區」之說甚囂塵上，但是萬華位於六座臺北縣市重要橋樑的交通樞紐，也是果菜市場、農產運銷公司、家禽及肉品市場等民生物資集散中心，最終首長評估之後認為不可行而作罷（李順德、董智森、孫蓉華，2003 年 5 月 11 日）。然而，面對基層政治與社會排山倒海的壓力，逼得政府不得不採取強力手段因應，在進出萬華區的路口設立量體溫與洗手設施，全區展開十日大消毒。5 月 9 日開始，更雷厲風行展開封街行動，動員軍、警、憲兵力量，對華昌國宅挨家挨戶展開清查，未回應者以開鎖、電鋸方式破門而入，國宅內 200 戶 775 位居民，被強制送往內湖基河三期國宅集中隔離（戴伯芬、吳偵宜，2015）。

筆者的家距離華昌國宅僅 450 公尺，在疫情爆發時，母親一度要我留在學校避難，千萬不要回家，我忍不住跑回家時，還被責罵一番。她和父親不但未開店營業，甚至不敢出門，怕被人家當作病毒傳播者，萬華區大理街陷入一片死寂。當時在進出各個機關行號時，採取登記實名制，需要填具住址與電話，我不寫住家改填學校住址，以減少

1 衛生署納入衛福部之後，改設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前的統計資料已不可查，因此引用呂志翔（2003 年 10 月 3 日）。



機構的拒絕或懷疑的眼光，當然也要避免在言談中洩漏自己是萬華人，更不能提及居住的街道名稱。做為萬華區居民「與有恥焉」，只能以隱瞞出身、低調避談撐過疫情黑暗期。

另一方面，市政府強制關閉街友集會的教會，萬華區街友「被勸導」進入「萬芳希望家園」隔離。在華昌國宅完成集體隔離之後，針對街友展開新一波集體隔離行動，透過街頭定點量測體溫，在社工、警方「柔性勸導」之下，轉送大直的武崗營區集中隔離，總計安置 160 人。國家動員軍力將荒廢八年的武崗營區於 3 日內整理完畢，可容 126 床，其中有 26 個單人隔離房，以安置身體發燒或女性街友為主；另 5 幢營舍 20 房，每房 5 人，可容納 100 人。社會局準備個人衛浴用具置於營房門口，單人房內有電扇和一間個人浴室，空間僅容一張單人床；5 人房則有電視、床位。街友在被隔離的期間可在營區內自由活動，但不得離開營區，在隔離 10 天後由市府提供補償金 5,000 元。社會局和警察局每天維持 4 至 5 人照管，大門出入由警察控管（戴伯芬、吳偵宜，2015：114）。一直到 6 月 20 日疫情趨緩停止安置後，護送街友返家者 71 人、轉送北縣營區 2 人、轉安置遊民收容所 44 人、轉送其他榮民之家 6 人、養護機構 1 人、住院 4 人、大眾運輸站 25 人、其他 7 人自行離開（顧燕翎、林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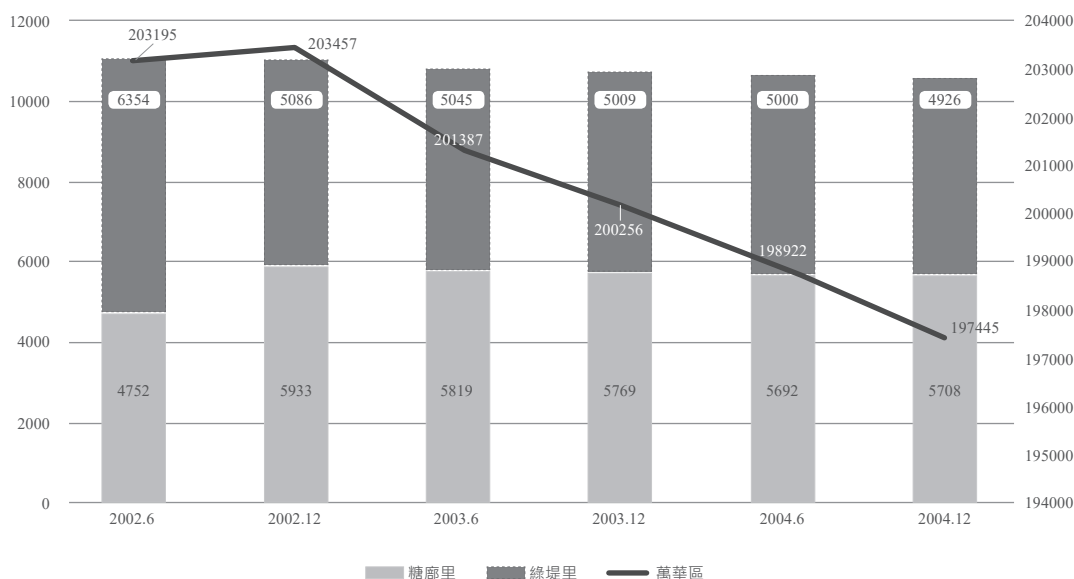
漪，2003：36）。

如果當時街友真的出現 SARS 帶原者，恐怕會在軍營中爆發集體感染，幸好安然無事解除隔離。萬華街友在社會上人人喊打的氛圍下，武崗軍營反而成了他們的避難所，不但有街友主動從萬華走到軍營門口要求隔離，解除隔離之後也有街友表示想要繼續留住軍營，顯示無家者所面對的困境。

SARS 事件過後 10 年，筆者與學生的研究調查（戴伯芬、吳偵宜，2015）發現當時被隔離的某些社區老人仍處於災後創傷症候群，無法回溯過去經驗而只能哭泣，田野教會中被隔離的街友 16 人，除一人當時逃離萬華避難之外，其餘不是失聯，就已過世。事後，有能力的人選擇搬離，2002 年 6 月至 12 月之間，萬華區糖廊與綠堤里人口減少了 87 人（萬華區增加 262 人），但是在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6 月的 SARS 流行期間，兩里人數減少 155 人，將近一倍，整個萬華區人口更大幅減少 2,070 人，一直到 2004 年 12 月，糖廊里人口才略止跌，增加 16 人，但不論是在鄰里或區域層次，人口依然持續減少中（參見圖 1）。

2011 年，臺北市政府發展局斥資 1,800 萬進行老舊社區改造，透過整頓巷道、種植路樹，增設國宅入口牌樓，

圖 1：萬華區綠堤、糖廍人口變化・2002 年 6 月～2004 年 12 月



資料來源：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取自 <https://whhr.gov.taipei/News.aspx?n=1F24EC8B247CA9D4&sms=-CE7A165B43B42948>

營造社區意象，但是多半僅是門面式的硬體裝飾，對於歷經 SARS 風暴的居民並未啟動心理輔導或諮商服務。而在光鮮的國宅門面下，高齡長者仍生活在無電梯上下的老舊公寓，國宅處修繕漏水往往需等上一年。即使國宅外觀改善（見圖 2、3），SARS 成了當時居民心

中永遠的痛。

新冠疫情下的街友處遇

2020 年 1 月，臺灣出現首起境外移入的新冠病例，行政院整合各部會資料建立「智慧型防疫系統」，透過居家

圖 2 | 華昌國宅入口門面



圖 3 | 華昌國宅現況



拍攝者 | 戴伯芬
時間 | 2021 年 9 月 26 日 16:30
地點 | 萬華華昌國宅



隔離、居家檢疫和自主健康管理機制，成功守下第一波新冠病毒攻擊，一直到年底都只有零星境外移入個案。2021 年 1 月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出現院內感染，5 月在宜蘭羅東、新北蘆洲、臺北萬華再次出現社區群聚感染。5 月 13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造成這場傳染性肺炎原因，是案 1203 前獅子會會長與萬華茶室個案「有人跟人的接觸，這樣的連結」（張茗喧，2021 年 5 月 13 日）。5 月 14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的案例圖，64 例確診個案中與萬華茶藝館相關者達 23 例。

5 月 15 日臺北都會區進入第三級防疫警戒，除了停止高中職上課之外，關閉休閒娛樂場所、禁止宗教活動，原來提供街友供餐服務的教會、社服團體被迫關閉。萬華的 NGO 組織工作人員冒著疫情風險站出來，改為主動發送生活物資給街友。此時，藝文界人士也紛紛站出來，提出萬華包容社會底層的說法，如臺客劇場導演林冠廷回應「萬華不是破口，是愛心的出口」，透過影像記錄涼粉伯及人生百味協會、芒草心等在地社福團體，定期發送營養食物、口罩給街友使用，而在地的禾順旅館業者

則提供友善防疫旅館協助收容²。

6 月 11 日，衛福部次長石崇良在立法院報告時指稱「武漢肺炎」本土疫情破口在萬華，更激起萬華在地人的不滿。立委林昶佐、蔣萬安、高虹安皆出面質詢衛福部官員失言，地方民意代表也紛紛跳出來反彈，市議員徐立信前往地檢署，控告石崇良萬華破口論違法，市議員鍾小平及萬華里長甚至帶頭至衛福部門口丟雞蛋，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要求衛福部次長為失言道歉，市長柯文哲則怒丟病歷。相較於之前由萬華區里長發起的清理弱勢運動，在選舉考量下，地方官員與民意代表槍口一致，對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由於疫情一開始就呈現決策與物資中央集權與統籌，並祭出巨額罰鍰來控管民眾脫罩行為，地方在有責無權下，要求中央政府全權負責。

新冠疫情開始之後，萬華區的街友依然是社會大眾擔心的「防疫破口」，市政府對於處理街友從過去強制隔離轉為自由放任。臺北市社會局利用每周夜訪，宣導中央最新防疫措施，專責檢疫站進行街友採檢，安排社工於艋舺公園周邊列冊街友關懷，持續發放關懷口

2 參見台客劇場，2021 年 6 月 23 日，〈萬華不是破口，是愛心的出口！到了現場才明白〉。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RdbtLT8Zg>

罩、量體溫，如有不適則協助就醫。不過，6月22日，臺北市爆出多名街友確診新冠肺炎，在5月疫情開始之後，艋舺公園周遭共計有6名街友陸續確診，臺北車站附近街友採檢之後又有5名確診者，市政府才展開街友安置，採檢之後進駐街友收容中心，然而願意主動接受採檢的街友有限，多數仍留置於艋舺公園中。

6月21日，臺北市長柯文哲宣布要讓「較具管控風險」群體優先施打疫苗³，理由是「太痛苦了，乾脆全部讓他們施打疫苗。」他認為遊民人不多，但每天北市局處的人都要盯著他們，擔心未戴口罩或者群聚。因此，自6月26日起啟動街友疫苗施打專案，臺北造冊列管的700位街友被納入優先施打的範圍，從住在遊民收容中心機構的街友開打，截至6月30日，有212名無家者完成疫苗接種，臺北市接受疫苗施打的街友人數仍未及三分之一，全臺也只有臺北、新北、雲林、嘉義4個縣市推動街友疫苗施打專案。

艋舺公園斗大黃色看板寫著「艱難時刻 萬華最團結！共同抗疫 期待昔日熱鬧光景再現」，鼓勵萬華居民團結



拍攝者 | 戴伯芬

時間 | 2021年6月25日7:00

地點 | 艋舺公園

抗疫，度過難關（圖4）。筆者於6月在艋舺公園進行田野時，看到一早數十位街友仍聚在艋舺公園聊天（圖5），顯示先採檢後安置的方式似乎無法預防街友的群聚感染，原因在於新冠病毒的感染力遠過於SARS病毒，未被安置或施打疫苗的街友，確實是染疫的高風險群。但是，市府卻未執行收容，更沒有提供社會住宅安置的打算。在反萬華污

3 其實新北市早在5月清查發現2名街友確診送醫後，即推出街友安心住計畫，安置202名街友，6月18日起更以專案方式為街友接種疫苗。



名的社會論述下，臺北市政府採取的是鬆散、消極的防疫作為，反而是民間團體主動介入，協助發送物資包，提供防疫、基本生存物資，彌補國家缺席下的照護角色。

看見性產業

明治 29 年（1896 年）日本殖民政府以臺北縣令第一號發佈「貸座敷及娼妓取締規則」，並於臺北艋舺、淡水及基隆三地設置遊廓，開臺灣公娼制度之始。艋舺遊廓位於後街以南下崁庄二至六丁的栗倉口街以內，以及新店街龍山寺街以西淡水河二至四丁以內，自此，艋舺成為艷名遠播的情色專區。光復之後，國民黨帶來大批軍人移民，需求助長了性產業，政府仍延續公娼制，萬華成為全臺最知名的情色產業集中區，隨著 60 年代之後臺灣經濟起飛，除了公娼之外，私娼氾濫，更成為人口販賣的性工作者集中地。

1987 年 1 月 10 日，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臺灣婦女救援協會、臺灣婦女基金會等數十幾個民間單位及機構齊聚艋舺龍山寺和華西街，展開救援雛妓行動，透過系列遊行、靜坐，抗議政

府縱容人口販賣及山地雛妓。1988 年 1 月，長老教會彩虹事工中心主任廖碧英發起華西街大遊行，隊伍進入萬華公娼區及周邊，反對政府放任萬華地區販賣人口以及原住民雛妓問題（李瓊月，1988），引發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雛妓問題的關注。不過，一直到 1997 年，臺北市長陳水扁才下令廢娼，在日日春等妓權團體的反對下，最後爭取到二年緩衝期，百年公娼制度終於在 2001 年走入歷史。

廢娼之後，萬華區的性產業化明為暗，除了傳統的茶店仔之外，結合飲食、理容、按摩、卡拉 OK 等活動，以掛羊頭賣狗肉方式，朝向多元化發展。2013 年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臺灣對中國開放金融、電信及美髮等 64 項產業，中國女性移民取代原來臺灣婦女，成為主要的性服務提供者⁴。

隨著人口高齡化，萬華茶室文化復興。由於茶室消費形態簡單，消費者多半為男性長者，因此被戲稱為「阿公店」，可分為茶桌仔與茶店仔，前者又稱「清茶館」，以喝茶聊天、唱卡拉 OK 為主，並未進行性交易；茶店仔則戲稱為「花茶館」，除了喝茶之外，也

4 參見 ETtoday 新聞雲，2013 年 7 月 10 日，〈拔毛、喇叭直接來 艋舺茶店仔陸妹稱霸趕走台妹〉。網址：<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30710/238683.htm#ixzz75eNhPaG4>



圖 6 | 西園路二段萬華茶室入口門牌

拍攝者 | 戴伯芬

時間 | 2021 年 6 月 25 日 7:00

地點 | 艋舺公園



圖 7 | 三水街巷內茶室外的街友

可以飲酒，同時可以進行性交易。

筆者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22 日、25 日，針對茶室文化老街（圖 6）進行三次實地調查，茶室皆已歇業，但一早仍有三五成群老人聚在一起聊天，某茶室門口還有街友睡覺（圖 7）。走過兒時熟習的巷弄，才發現這個區已經完全轉為茶室聚集區，舉頭可見具有性暗示的店名，召喚消費者的慾望。依據臺北市商業處的資料，此區登記在案的茶室有 87 家，非法業者有 14 家⁵，集中於廣州街與和平西路、西園路與梧州街之間的街區。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萬華性產業消費者的樣貌才開始被媒體揭露。五月份

確診諸多案例都有萬華茶室的足跡，其中 5 月 21 日公布的案 2747 更引發社會大眾的矚目，案主年屆 60 歲，自 4 月 17 日至 5 月 12 日之間，連續 26 天，固定在下午搭乘臺鐵區間車前往萬華「得意春茶室」消費，待了整個下午，晚上十點才搭車返回八堵車站。原來男性高齡者已經成為萬華茶室主要的性產業消費群，他們來此喝茶、聊天、唱

5 非法業者已被市府勒令於 8 月下旬自行拆除，方得申請復業，但是在八大行業尚未能復業之前，業者仍採取觀望態度。



卡 OK，找老友談天說地，可說是男性高齡者的「桌遊」，作家林立青（2021 年 7 月 7 日）形容萬華為「全方位綜合長照中心」，包辦全臺高齡者吃喝、玩樂的暮年生活。

隨著臺北疫情升溫，萬華阿公店成為新冠疫情的熱點，SARS 時期曾被點名為傳染源的「流鶯」，在此次疫情成為眾矢之的。5 月 13 日，臺北市長柯文哲下令萬華分局所列管 172 家的茶藝館兼飲酒店，全面停業 3 天，待消毒完畢，方可再申請復業⁶，但截至 8 月 31 日，萬華阿公店仍未獲准營業。而萬華茶室的無證移工，雖被列為優先篩檢與施打疫苗，但是也同樣面臨無法工作的困境。自疫情三級警戒以來，八大行業已近四個月無法營業。8 月 24 日至 9 月 6 日降為二級警戒，各行業皆有條件復業，唯八大行業依然無法營業⁷。而市府對於萬華茶室無證移工，也從「特赦」、優先施打疫苗，改為零容忍、不得工作，在疫情壓力下禁止移民性工作復工。

9 月初，臺灣各地的八大行業業者開始出現抗議行動，臺中市一群從業人員高舉「八大無罪」大字報，出面抗

議，呼籲政府「給一條生路」；臺南市育樂事業商業權益促進會也到市府前舉布條抗議，訴求有條件准許復業。在經歷一連串的婦運之後，萬華性產業成為擁娼與廢娼的全民公敵，「不道德的業者」再加上「病毒帶原者」的指責，使得萬華的茶室業者一直不敢站到第一線發聲。9 月 23 日，經濟部為八大行業提出紓困方案，一次性補貼 4 萬元，停業四個月的雇主營運補貼 1 萬元，員工薪資補貼為 3 萬元，仍待行政院核定（梁珮綺，2021 年 9 月 24 日）。在政府遲遲無法開放，又未提供紓困措施的情形下，許多業者只能另謀生計，而性工作者則被迫轉往其他管制較鬆散的縣市工作。

包容抑或排除？疫情下的萬華團結再生

對比兩次疫情下萬華弱勢群體的處遇，反映了臺灣政治民主化發展的困境與社會包容下底層階級生存的韌性。國家的防疫政策從維持政治合法性而行使暴力展演，改進了之前 SARS 的中央、地方政府鬥爭，改採權力集中化的經濟制裁手段，製造出無法監理的決策黑箱，

6 參見中央社，2021 年 5 月 13 日，〈臺北市萬華區 172 家茶藝館酒店停業 3 天 疫調消毒〉。網址：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5130085.aspx

7 嚴格說來，茶室並不在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吧、酒店（廊）、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視聽歌唱場所、理容院的八大行業之內。

受疫情影響人民集中隔離的尺度與範圍遠甚於 SARS 時期，但卻是私下進行，中央政府官員污名化社區來轉移防疫不力的指責，退出國家弱勢照護的角色，而以疫情為主題的政治鬥爭仍在進行，目的在擴大政客們的網路聲量。

2003 年 SARS 疫情升高，基於地方基層政治與民間社會壓力，政府對於萬華展開展演式的強制、集體隔離措施，萬華區中低社經地位的國宅、街友、性工作者等社會偏差者被匡列為代罪羔羊，從街頭測量體溫、居家隔离，到集體易地隔離，透過主流媒體轉播的淨化儀式，讓疑似 SARS 感染的華昌國宅居民被強制押送到基河國宅，與和平醫院的感染個案比鄰隔離，而原屬低危險群的街友被規勸利誘到軍營進行集中控管。

2020 年的新冠危機，媒體從過去渲染式報導到多元爭鳴，主流之外的自媒體影響力擴張，有助於反轉萬華的污名。民間社會從噤聲到行動，主動捍衛

國家放任主義下弱勢者的生存權。民間社會對於萬華觀點的轉變，不但翻轉了官方習於加諸弱勢者的污名論述，更主動出擊來保護弱勢者的生存權。相較於過去街友「被安置」於武崗營區，現在街友可以在艋舺自由行動，待遇大為不同，但是政府在防疫的作為卻依然缺乏整體策略，依舊漠視街友的居住、生存權，對他們的歧視心態依舊，是以減少他們對於社會大眾的染疫風險為考量，而非基於基本人權的安置、人道關懷的服務。

而在 SARS 期間未被公開圍剿的性產業，此次成為疫情下民間社會嘲弄的小歡愉，「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轉為一語雙關的黃色笑話，同時貶抑了性工作者的工作權與男性高齡者的消費日常，懷舊的互動消費被簡單化為女移工的敗德賣淫，高齡孤寂轉為老不修的色慾流動。萬華，一個清代的繁華城市衰敗了，在情色網絡經濟來臨之際，不合時宜地凍結在前現代港口城市下的慾望，在疫情下被逐一驅散。

參考文獻

- 江慧琄、張茗喧（2021 年 5 月 28 日）。〈萬華高風險族群健保卡註記 29 日後將依法刪除〉。《中央通訊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5280042.aspx>
- 呂志翔（2003 年 10 月 3 日）。〈世衛大幅向下修正台灣 SARS 病例數與死亡人數〉。《中央社》。取自 <https://www.stat.nuk.edu.tw/prost/news/join.asp?ID=1288>



李順德、董智森、孫蓉華（2003年5月11日）。〈萬華「封區」之說 北市縣首長搖頭〉。《聯合報》。取自 <http://www.hsin-yi.org.tw/talk/before/talk/bbs/content.asp?SubID=137464&id=137937>

李瓊月（1988）。〈救援雛妓再出擊〉。《婦女新知》，69：1-7。

林立青（2021年7月7日）。〈萬華，你好嗎！作家林立青：Always open！全台最大全方位綜合長照中心〉。《Openbook》。取自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4866>

張茗喧（2021年5月13日）。〈獅子會染疫案源曾到萬華茶藝館 跟確診個案有「人與人連結」〉。《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5130058.aspx>

梁珮綺（2021年9月24日）。〈八大行業紓困擬補貼員工薪資3萬元 經部：核定後說明〉。《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109230430.aspx>

郭慧明（2004）。《我要活下去！遊民的生存策略和生活世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伯芬、吳偵宜（2015）。〈邊界危機與淨化儀式：SARS事件中失落社群的補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1：87-123。

蘇思芸（2021年5月19日）。〈政論節目用「萬華病毒」惹議 NCC收8件申訴〉。《中央通訊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105260240.aspx>

顧燕翎、林玟漪（2003）。〈臺北市府社會局 SARS 防疫工作實錄暨相關建議〉。《社區發展季刊》，104：32-44。